

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回顾与展望

施雪琴

[摘 要] 东南亚作为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地区,同时东南亚也是华侨华人聚居的主要地区,如何利用华侨华人开展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课题。通过在跨国移民与国际关系互动的框架下,探讨移民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角色与优势,以中国在东南亚开展侨务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历史为鉴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东南亚以侨务为轴心的公共外交方式、特点、效果与局限,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挖掘并整合东南亚华社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中国在东南亚促进公共外交的新方式、新媒介、新平台的现状,可为中国政府如何依靠公共外交来塑造中国形象,提升软实力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移民;华侨华人;东南亚;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3)01-0012-07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成为热点话题,在中国—东南亚政治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进程中,凸显出一些阻碍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的负面因素,如在东南亚国家广泛存在并且蔓延的“中国威胁论”等声音,严重影响了东南亚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东南亚国家与社会对中国普遍缺乏信任,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在东南亚的塑造,必然成为双方关系深化的不可忽视的障碍。“中国威胁论”的重新抬头及其在东南亚的蔓延,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又与双方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凸显的政治认同差异、经济竞争、领海岛礁纠纷等一系列问题有关,既与后冷战时期亚太国际关系秩序变革引发的权力结构变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话语渲染密切相关,又与中国政府在长期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中的偏重传统外交,忽视公共外交的机制有关。东南亚作为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近邻,双方有超过千年的文化与社会交流,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的

主要地区,华侨华人在东南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如何利用东南亚华侨华人展开公共外交,在东南亚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重塑中国形象成为中国外交领域一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二战以来,不断高涨的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浪潮,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庞大的跨国迁移人口不仅对人口输出国与输入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与广泛的影响,而且跨国移民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学术界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多学科研究的课题。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跨国移民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①“移民被作为一种不受传统国界约束的政治产物”,^②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的桥梁与纽带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那些既作为输出国的文化载体,又在居住国享有重要政治经济

[收稿日期] 2012-10-28

[基金项目] 中国侨联2011年一般项目《冷战后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对华社影响研究》(11BZQK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施雪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福建厦门,361005)。

①相关研究见 Yossi shain, *Kinship and Diaspor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Liu Hong, *Chinese Overseas and a rising China*, in Zheng Yongnian ed,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Routledge, 2010. 关于海外印度人与印度外交参见 C.Raja Mohan, *Indian Diaspora and Soft Power*, *The Hindu*, January 6, 2003. Rubinoff A.G. *The Diaspora as a factor in US-India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Fall 2005. Devesh Kapur, *Diaspor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与社会地位的海外移民族群,被母国视为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软实力”。^①可以说,海外移民正在成为母国与居住国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越来越重要的工具与媒介。从全球来看,海外移民对公共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拥有强大海外移民群体的以色列专门设有公共外交与海外移民部来推动海外犹太人在以色列公共外交中的角色与地位。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拥有3000多万的海外印裔,因此也特别重视海外印度人对提升印度软实力的影响,专门设立了“海外印度人节”(Pravasi Bharatiya Divas)来促进与加强海外印度人在印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同时,海外印度人在促进印度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提升印度的国际形象方面也得到高度重视。在印度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中,海外印度人成为推广印度文化与印度形象的主要媒介。澳大利亚政府在其公共外交战略中,也认识到海外澳大利亚人的优势与重要性。2007年,在澳大利亚议会的一份报告中,特别有一章题为“公共外交与更广阔的社会”,其中讨论了澳大利亚在21世纪外交政策的方向与路径。在这一章里,重点提到海外澳大利亚人在推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报告建议“政府应将海外澳大利亚同胞视为开展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海外澳人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信息沟通、发展对外关系、促进澳大利亚利益方面。”^②美国作为一个吸收各国移民的大国,越来越关注各国海外移民群体在美国对外政策、外交关系中的角色与影响。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实施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在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优势地位的确立使美国减少了其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投入。然而“9·11”事件爆发后,阿拉伯世界广泛存在的反美情绪将美国唤醒,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公共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误,并迅速纠正外交政策中的偏差,开始加大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宣传力度,积极推动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并提出重新重视公共外交的战略。^③美国利用其是各国移民聚集地的特点,加

强与各国移民的沟通与联系,宣传与合作,通过对移民的宣传来影响移民输出国公众的对美舆论、提升美国形象,最终影响政府的对美政策。2011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办公室的全球伙伴计划(GPI)与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联合发起成立了国际移民接触联盟(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简称IDEA)。该组织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其宗旨是促进以移民为主体的国际合作计划,推动移民输出国的贸易与投资、自愿服务精神、慈善事业、外交、工商业以及创新能力发展。^④在IDEA的宗旨中,尤其重视移民在外交、倡议与和平建设领域的角色,^⑤试图通过体育、艺术以及文化交流等非传统外交手段来加强移民在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中的影响。IDEA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倡议,在美国国际援助署与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协助下,在华盛顿召开了首次“国务卿全球移民论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美国国际援助署的执行官拉杰夫·沙罕博士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主题为“海外移民与外交”、“美国国务院与移民组织建立新伙伴”关系的演讲,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美国移民团体与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机构的联系,加强他们与母国在各个领域的联系,以此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现。

二

学术界与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对移民参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开发,其原因在于公共外交的特点以及跨国移民在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优势。公共外交活动历时悠久,但是长期以来,它更多地是被作为传统外交处理涉及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问题的附属形式。西方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开始注意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并在1960年代开始展开对公共外交的系统研究。现代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美国。1965年,美国退休外交官、塔夫斯大学外交学教授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公共外交这一专业术语,将其定义为:“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

①详情请参阅 <http://diasporaalliance.org/>。

②2010年,美国国际援助署(USAID)与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题为《迁移后的呼声:海外移民的倡议》(Voice after Exit: Diaspora Advocacy)的报告,强调重视发挥海外移民族群、移民组织与个体在祖籍国与居住国的政治倡议角色与影响。参见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diasporas-advocacy.pdf>。

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与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5]

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的实现。”^[6]公共外交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教育交流、旅游观光、语言学习、文化艺术交流、广播电视传播等。根据学者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以及国外对公共外交的实践,公共外交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之中央政府或者经由中央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地方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第二,公共外交的行为对象是海外公众。第三,公共外交的手段是公关、传播、人文交流与援助等。第四,公共外交的直接目标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最终目的是推进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6]

公共外交的特点、方式、过程、目标及宗旨都决定了跨国移民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跨国移民具有参与公共外交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公共外交的受众是外国公众,海外移民在公共外交中,是一群身份比较特殊的受众,他们一方面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民众,另一方面与祖籍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方面是母国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又长期居住在海外,深受居住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他们对双方社会文化的了解与熟悉使他们成为沟通祖籍国与居住国政府与民众的最直接的媒介与桥梁。第二,公共外交的方式与过程表现出来的长期性与常态化特征,使跨国移民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公共外交战略的关键在于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因此,它要求首先要从理解外国文化、公众需要等开始,在关系深化后,通过舆论宣传、文化与社会交流达到公共外交的宗旨,即提升本国的知名度与形象,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好感,甚至促使外国政府在相关问题的态度

上与本国一致;促进外国公众到本国观光旅游、学习甚至认同本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影响外国公众的行为与立场,游说政治家对本国的立场。要达到上述目标,公共外交政策的实施要注意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注意日常的传播与交流,交流与传播要常态化,而不是临时性与突发性的宣传与推广,坚持长期性与常态化是公共外交宣传中的重要特征。而海外移民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居住国文化的熟悉度以及他们在海外的常态化居住等特征使他们成为推动公共外交实践不可忽视的媒介。第三,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的宣传报道也在对外宣传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与精英名人,他们的言论宣传成为影响外国公众集体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重视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移民组织以及移民精英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在公共外交的结构中,社会精英在公共外交战略与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注意涵养海外移民中的精英人物以及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成为一些移民大国政府重点关注的课题。以海外印度人為例,印裔美国人在提升印度形象、推动印度的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印裔美国人较高比例的高素质人才有密切关系。^[7]而美国犹太人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尤其是精英犹太人构成的各种院外集团则成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8]

三

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外移民群体的国家。据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的估计,截至2011年,全球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5000万,其中70%以上聚居在东南亚。^①近代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海外华人聚集的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华人凭借着在东南亚的独特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广泛联系,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回顾历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新中国的外交史

①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1/30/c_111206719.htm。

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1960 年代初期,东南亚华侨华人事务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因素,华侨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侨务工作也成为服务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工具。1956 年 10 月,中国侨联副主席庄希泉在第一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所做的题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当前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前侨务工作必须服从外交政策”,^[9]为这一时期侨务工作的定位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从历史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工作与侨务的关系非常密切,相互融合,可谓“侨务外交”时期。“侨务外交”在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工作中至少包含三重内容:第一,处理侨务、保护华侨华人权益成为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第二,在当时冷战环境下,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反对台湾蒋介石政权,争取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好感、信任与支持,促进东南亚华侨华人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承认与拥护,最终促进祖国统一成为新中国“侨务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第三,通过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向居住国宣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文化发展,塑造新中国正义、进步、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即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社会的美誉度、信任度与认同度,从而争取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新中国的好感、信任与支持。因此,这一时期新中国的侨务外交必然糅合了公共外交的特征与方式,表现为东南亚华侨华人既是新中国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与渠道,也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受众。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处在极其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除缅甸、印尼、越南等国家承认新中国外,一些国家在西方的操纵下,或加入了西方国家领导的反华同盟,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施遏制政策。在这样的外交困境下,争取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北京,并利用亲北京的华侨华人来促进新中国与海外沟通,向东南亚公众宣传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成

为新中国初期重要的外交战略。

在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政策实践过程中,明显带有公共外交的特征与方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东南亚华侨华人归国观光,向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侨乡的巨大变化。1950 年代,由中国政府各级侨联与东南亚华社组织的各类东南亚华侨华人回国观光团的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兼具侨务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功能,不仅成为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机制,更是新中国向东南亚华社开展公共宣传的重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后,为争取侨心,凝聚侨力,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组织各种形式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参观活动。观光团成员主要由亲北京的侨领、社会名流、华文报社主编以及其他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各界华侨华人构成,成员主要来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尼、缅甸,也有少部分来自印度、朝鲜、越南、马来亚与泰国。印尼、缅甸华侨华人是归国观光团的主要成员。^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华人回国观光热情十分高涨,人数一年超过一年,据广东侨务委员会统计,至 1957 年 4 月,回国观光省亲的粤籍华侨就有 1 万人以上。^②另据不完全统计,1954~1964 年,仅广东新会县侨务部门就接待海外华人、华侨回国观光团 26 批、共 939 人。^③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国回乡。通过参观访问、座谈,不仅密切了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而且也促进了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了解,并通过他们将新中国的形象向海外传播,这对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沟通中国与东南亚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观光团成员返回后的宣传报道成为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媒介。以印尼为例,从 1952 年开始,在获得印尼当局同意颁发印尼华侨华人来回准字后,印尼华社每年都组织华侨华人回国观光团活动。观光团成员返回后,各地华社不仅组织座谈会,邀请观光团成员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侨乡新貌,并且观光团成员还在当地亲北

①如印华第二届观光团,成员包括印尼华侨华人 67 人,缅甸华人 37 人,印度华人 10 人,马来亚与暹罗归侨 10 人,朝鲜归侨 3 人。团长由印尼侨领司马赞担任。见《生活报》(印尼)1953 年 1 月 16 日报道。

②(香港)大公报《华侨今年回国观光,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多》,1957 年 4 月 4 日。南洋研究院剪报资料合辑本《华侨回国观光团》,登记号 0702。

③参见新会县政府网站 <http://www.xinhui.gov.cn/export/xhsz/sz/sz08-5.htm>。

京的华文报上,如印尼的《生活报》(雅加达)、《新报》(雅加达)、《大公报》(泗水)等,撰文发表大量新中国观感。1952年7~11月,缅甸、印尼、印度等国的闽籍华侨回国参观团在东北、华北、华中与华南参观工厂、农场、机关、学校后,目睹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纷纷寄观感文字给华侨报纸发表,或者接见华侨记者畅叙此行印象,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向居住国华社与当地社会传播,成为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肇始。如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团长宋中铨先生在雅加达颇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新报》上撰文,颂扬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称赞“祖国太可爱”。^①通过这些华侨回国观光,新中国的崭新形象,随着华人的宣传而被印尼华侨华人社会认同与拥护,这对争取侨心,凝聚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促使大批华侨华人回国省亲、升学、就业、投资,同时也为新中国在印尼侨社与台湾政权争夺政治空间与社会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东南亚华文报纸成为宣传新中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媒介与平台。例如,印尼著名华文报《生活报》、《新报》是1950年代宣传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平外交政策、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平台,不仅是印尼侨社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侨乡发展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与平台。

第三,通过印尼侨社在印尼各地举行新中国和平建设图片展览,向华社与印尼军政领导与普通民众介绍与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与形象。

总结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围绕侨务在东南亚推广公共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可以说它具备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与特征,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外交的影响。这是因为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敌对状态,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侨务外交与公共外交政策上。例如,在1950年代东南亚各地华社亲北京与亲台湾的华文报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宣传”痕迹,双方口诛笔伐,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这是冷战时期两大敌对阵营公共外交的普遍特征。此外,由于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这一时期新中国的公共外交与侨务

外交密切相联,主要以海外侨民为受体,还不可能广泛地向相关东南亚国家的普通民众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共外交的效果。

四

从196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华侨参与公共外交陷入停滞状态。一方面,中国极左思潮泛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达到顶峰。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华侨华人难逃被污名化与罪化的厄运,导致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在国内的眷属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归入一个“政治错误”的类型,国内各种涉及侨务的机构也遭到严重破坏,侨务外交工作完全瘫痪或者瓦解,直接导致侨务外交以及以侨为媒介的公共外交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也被破坏。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剧变,尤其是中印(尼)关系、中缅关系以及后来中越关系的恶化,三国爆发大规模反华、排华活动,使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逐渐陷入疏远或者冻结,以侨为媒介与纽带的公共外交机制也自然陷于停滞状态。19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逐渐恢复与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及新加坡外交关系的恢复与建交,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除了重视对东盟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外交外,还逐渐重视发掘东南亚华社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并将其整合到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与机制之中。

首先,挖掘东南亚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家共同拥有、认同并推崇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并将其整合到中国—东南亚外交的战略中。如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主办的郑和下西洋的纪念与宣传活动、以及将“文化郑和”整合到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外交政策中,都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战略思想。“文化郑和”的雏形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郑和崇拜。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是一个被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其他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进一步解读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一种规范与准则。一方面,郑和作为历史伟人,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①参见《厦门侨联》1952年年刊,第16页。

“宣德化而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等外交政策反映了历史上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强调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郑和在东南亚社会文化语境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尤其是东南亚社会文化中广泛存在的郑和崇拜,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其他族群对郑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武、慈爱、仁善与和平等价值观的认同与继承。此外,值得指出的是,郑和崇拜虽源于东南亚华侨社会,但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东南亚华人群与东南亚地域,演变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并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正演绎成为一种展示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象征。^①今天,这种以“文化郑和”来推动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外交理念也被东南亚国家所认同。尤其是马来西亚,作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访的国家,郑和船队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和穆斯林的身份更加强了马来西亚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对郑和的认同与亲近感。近年来,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政治与经贸伙伴,从华人社会到马来西亚政府都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郑和自然成为强化双方关系的纽带,从官方到民间,都极其重视纪念与宣传郑和,^②藉此来探寻新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规范与方向。这表明,“文化郑和”不仅被中国所重视,也被东南亚国家与社会所重视,不仅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积极推动郑和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体现了东南亚国家与社会对中国这种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方式的认可与积极回应。

第二,注重利用世界(东南亚)华人网络及世界性的华人论坛,如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等平台,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共促经济繁荣、构建和谐世界的声音。东南亚是世界华商聚集的主要地区,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东南亚华人经济与

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整合,在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东南亚华人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为加强全球华商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199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组织召开了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之后世界华商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由相关国家(地区)的华人工商社团筹办。迄今,已先后在新加坡、香港、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共举办了11届世界华商大会。大会举行期间,除主办方当地的政府首脑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外,还邀请世界华商顶尖人物以及研究华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名家与会发表演讲,中国政府也利用这个世界性的华商盛会,每年都派出相关政经要人参加并发表演讲。可以说,世界华商大会,不仅是加强中国与海外华人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带,同时还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利用世界华商大会这种非政府机构以及全球华商网络来促进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此外,由中国新闻社、国务院侨办以及相关地方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也可视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探索利用海外华文媒体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举措。该论坛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全球掀起中国热的背景下由中国政府倡议召开的。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中西媒体有不同的声音,在英文媒体占据优势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全球华文媒体都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对全面、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明显有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世界华文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向海外华社全面、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并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与华人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华文媒体的重镇,有众多的华文报刊,近年来关于中国的报道成为东南亚华文报纸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印尼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国际日报》,自2001年创办以来,不仅是印尼华社了解中国不

①关于“文化郑和”与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具体论述,请参看拙文《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②例如,1993年8月,马来西亚时任首相马哈蒂尔曾率领五百人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曾到与郑和有密切关系的西安大清真寺做礼拜;1994年9月,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访华时特访南京,参观郑和衣冠冢墓园,向这位马中共仰的伟人致敬。2005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马六甲举行了一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2009年12月27日至31日,应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郑和文教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李金友公爵的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联酋和中国等七个国家的华人穆斯林企业家和文化人士齐聚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起成立“郑和国际经济文化发展联合会”,马哈蒂尔出席了这次华人穆斯林企业家盛会并致辞。

可缺少的窗口,而且成为宣传中印尼经贸合作与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世界华文媒体论坛自 2001 年创办以来,每两年一次,分别在中国的各个省会城市召开,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全球华文媒体界的国际峰会,受到业界高度关注。它不仅在加强全球华文媒体联系与合作,提升华文媒体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扩大全球华文媒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促进关于中国的积极报道,全面、真实、客观地传播中国形象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三,挖掘东南亚华人社会与文化资源,将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结合起来,并重点以文化为纽带,开展各种文化交流与教育活动,如各种华人青少年中文补习班、中华文化寻根游、文化夏令营、冬令营、孔子学院等机制,对整合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的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10]

结 语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成为政府部门与学界关注的焦点。2008 年 1~2 月,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联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在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六个国家就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的软实力向约 6000 名公众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问题集中在代表软实力的各项指标包括文化与价值体系吸引力、区域领袖效力、外交斡旋能力、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以及人力资源水准等方面。该调查结果于 2008 年 6 月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四国半成以上的民众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未来的领袖,但中国在亚洲的软实力综合指数依然落后于美国与日本。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不断增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让受访者(除越南外)整体上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感在日本尤甚。报告显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综合指数在东北亚地区民众(中国、日本、韩国)心目中,仍排名第一,而东南亚民众(印尼与越南)则认为日

本更具有影响力。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波顿指出:“中国仍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其软实力,尤其是外交、社会与文化领域。中国仍需要很努力来争取本区域的民心与认同感,加强其在亚洲的信誉。”

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透露出中国在东亚软实力与公共外交方面的弱势与困境,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了许多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利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社会文化资源,扩大对东南亚社会的公共外交以增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成为摆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学者面前的一个长期课题。

[参考文献]

- [1]Yossi shain, Kinship and Diaspor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 [2]C.Raja Mohan, Indian Diaspora and Soft Power [N]. The Hindu 2003- 01- 06.
- [3]The Senate Standing Commit on 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Australia's Public diplomacy: Building Our Image[M].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7:135- 141.
- [4]Mark Leonard. Diplomacy by other Means[J]. Foreign Policy 2002 (132).
- [5]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6]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8.
- [7]Rubinoff A.G. The Diaspora as a factor in US- India Relations[J]. Asian Affaires, Fall 2005.
- [8]Thomas Ambrosio. Ethnic identity group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143- 168.
- [9]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 Changing Policy 1949- 1970[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0]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M]. Pra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责任编辑 李君安]

Abstra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ort Economy and Urban Economy

Zhu Jianzhen

Abstract: China is in the period with rapid port construction and fast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apacities of port city by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ort function and city function.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port-city economic system, the entropy method is adopted to select the coupling element indicators for the port economy and the urban economy. With Shenzhen port as the example, the coupling degree model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re applied for empirical study to carry out dynamic analysi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ort economy and the urban economy. Studies show that, over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1,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port economy and the urban economy showed a positive trend, and its coupling development transformed from serious uncoordinated recession to advanc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t showed a trend toward high 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wing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Key words: port economy; urban economy; coupling degre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Review and Prospect

Shi Xueqin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is China's neighbor and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addition, Southeast Asia is also the main area where many overseas Chinese live. 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or the rol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itions, roles and advantages of migrants in public diplomacy. With the case study on China's diplomacy through overseas Chinese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effects and limits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by relying mainly on overseas Chinese.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Chinese government explores and integrat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 explores new patterns, new media and new platform for China to promote publ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Thus, it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build its image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nd to improve its soft power.

Key words: migrant; overseas Chinese; Southeast Asia; public diplomacy

Evolutions of Cadre Selection Patter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Di Chengguang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cadre selec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adre system and a key a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dre groups.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ongres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China has reformed many aspects of its cadre system, and the pattern of cadre selection has already undergone and will continue to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pecific practices in the reform of the cadre system over past 30 years, the evolutions of cadre selection pattern in China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hrases: First, fro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ongress to the 13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single pattern of cadre selection — the cadres being selected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second, from the 13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iverse patterns of cadre selection are explored while selecting cadre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remains as the main pattern; third, since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pen selec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ttern in the cadre selection.

Key words: reform of cadre system; cadre selection; open selection; important path

Study on the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iu Wenhao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Confucian culture, Taoist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contains profound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harmony between the nature and men" as its core concept, Confucian school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loving everything" and eventually makes practical view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dvocating the view of "integrating of all things and following the nature", Taoist school proposes the ethical view of "Tao is the fountainhead of everything, and following the Tao and ethics", and it eventually forms its ecological views with "natural inaction" as the guidance. Buddhist school summari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altruism theory" and "holism",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respecting life and protecting the nature", which i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divine intervention and pursuing a calm mind".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fucian culture; Taoist culture; Buddhist culture

To Build a Manufacturing Power by Being Problem-Oriented

Zhou Minliang

Abstract: Build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 i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set by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which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by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2012.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economic competitions in the manufacturing field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be problem-oriented and analyze the practical shortages and constraints. We should also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fighting against bubble economy and tak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policies to mak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